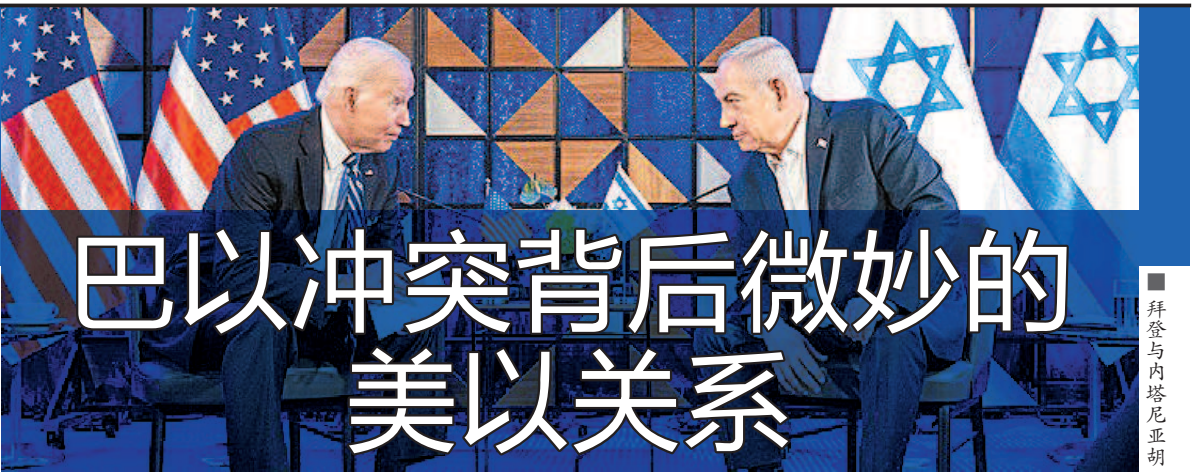


长达半年之久的巴以新一轮冲突,给美国和以色列的紧密关系撕开了一道裂痕。美国从偏袒以色列,到为安理会呼吁停火的决议“开绿灯”;以色列从“一意孤行”,到突然撤军,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编者



肖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1 问:3月底,美国投下弃权票,令联合国安理会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立即实现停火。究竟发生了什么让美国开始转变对以色列的态度?

答:拜登政府被美国媒体称为有史以来最亲以色列的一届美国政府。拜登曾经不止一次表示,由于自身的政治经历,他有着非常深厚的以色列情结,甚至把支持以色列视为一种道德原则的要求。正是因此,在去年10月8日最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拜登立即站了出来,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坚如磐石、不可动摇,美国将坚定站在以色列一边。任何东西,只要以色列需要,美国就会倾囊相授。拜登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在长达六个月的冲突中一面不断向以色列提供各类武器弹药,一面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其他国家提出的各类要求立即停火的决议案。

然而,拜登的“我本一心向明月”,却没有换来内塔尼亚胡的对等“体谅”。由于以色列在冲突中的无所不用其极,拜登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内外压力。如果说面对国际压力,白宫还可以充耳不闻,那么在大选年,遭遇的国内压力就无法忽视。为了减轻压力,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在内的拜登政府高官,多次公开要求以色列改变在加沙地带的“无差别打击”战术,允许更多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并且不得在“没有适当善后方案”的情况下进攻有着140万人口的南部城市拉法。然而,内塔尼亚胡政府对此似乎充耳不闻,不仅在战术和人道主义援助问题上无动于衷,甚至公然声称已经批准了大举进攻拉法的计划,要借此彻底消灭哈马斯。以色列毫无回旋的顽固态度不仅使得拜登政府“颜面尽失”,也让华盛顿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白宫的对以政策,认为正是因为拜登本人的纵容才会导致出现美以关系当前的局面。

2 问:面对“孤注一掷”的以色列,美国的影响力究竟几何?

答:3月以来,为阻止内塔尼亚胡“孤注一掷”,拜登政府不断加码对以施压力度。首先,华盛顿不断做出一些威胁内塔尼亚胡“政治生命”的小动作,包括让惯来亲以的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舒默放话,呼吁以色列尽早重新选举,以及邀请以战时内阁成员、未来可能取代内塔尼亚胡出任总理的以国家团结党领袖甘茨访美。看到政治威胁没有立即“软化”内塔尼亚胡,在3月25日的安理会投票中,美国代表一反不断“否决”的常态,投“弃权”票放行了一份要求巴以立即停火的决议。虽然之后美方放话,表示“美国的对以政策没有发生变化”,声称决议没有法律效应,以此控制投弃权票对美以关系的冲击,但是没有人会真的认为,美国的对以政策没有变化。

对于拜登的强硬施压,内塔尼亚胡的第一反应也是强硬回击,公开宣布取消派高级代表团赴美讨论拉法问题的行程,随后又将其“降格”为视频会议。4月1日,以色列更是悍然袭击伊朗驻叙利亚的领事馆,造成包括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在内的7名伊朗公民身亡,试图将局面进一步搅乱,拖美国下水。面对这一不堪局面,拜登终于在4月4日向内塔尼亚胡发出“最后通牒”,表示以色列只有“数天甚至是数小时”的时间来改变自己的加沙政策,如果其没有实质改变,那么“就只有让我们来做出改变了”。所谓“变化”就是将美国对以军援与以加沙政策“挂钩”,也就是威胁以色列,如果不满足

3 问:在大选年的背景之下,美以之间的微妙关系接下来将如何发展?

答:对于以色列的政策调整,如释重负的拜登政府在第一时间予以欢迎,但同时后者也难言就此放心。多次在加沙问题上与以政府交涉的国务卿布林肯就表示,“真正的考验是能否获得成果,我们将在未来数天和数周对此保持关注”。之所以如此,自然是担心内塔尼亚胡政府再有反复。去年11月,以色列一度与哈马斯达成了为期一周的临时停火协议,后者也释放了半数被扣人质。当时,包括美国在内,国际社会多方都期望抓住这一机会,将临时停火转变为永久停火,结束这一轮危机。然而,迫于强大的国内政治压力,内塔尼亚胡以哈马斯的军事打击破坏停火为由,开始在加沙北部执行“焦土政策”,在加沙南部实施完全包围,试图以极为残酷的镇压打造出一个所谓的“去冲突地带”。此后,巴勒

斯坦平民死伤人数迅速从11月底的1.3万人攀升到3月底的3.2万人。

数字的上升使拜登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国内政治麻烦,阿拉伯和穆斯林裔美国人、普遍同情巴勒斯坦的年轻人,还有进步主义者等民主党“票仓”对白宫的不满日益加剧,民主党选民对拜登对以政策的支持率也从11月的60%跌落到当前的47%,独立选民的支持率甚至只有区区21%。拜登在全美各地的助选活动,也会“日常”遭遇抗议。如果内塔尼亚胡政府未来再复制“退一步,进两步”的做法,大举进攻拉法,那么伴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拜登团队恐怕将面临大麻烦。届时,即使拜登选择“壮士断腕”,断然与以色列切割,也会因其之前持续纵容和包庇内塔尼亚胡政府

美国在对加沙战术、人道主义援助和拉法问题上的要求,美国将会减少、减缓乃至暂停军事援助。在内塔尼亚胡亲口答应拜登“将会照办”之后,拜登进一步要求,以方不能只是私下答应,必须在当天就公开宣布。

当天晚上,以战时内阁正式批准,重新开放冲突爆发后就遭到封闭的加沙北部埃雷兹口岸,暂时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得以通过阿什杜德港进入加沙地带,同时放宽凯雷姆沙洛姆口岸的输入限制,让更多物资得以从约旦进入。之后,以色列进一步从加沙地带撤出地面部队,同时宣布继续与哈马斯代表在开罗就长期停火展开磋商。最终,在巴以冲突将美以关系带入“濒临破灭”的转折点,是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政府在美国的安全威胁前让步,让两国关系暂时度过危机。这也证明了之前国际关系理论家斯蒂芬·沃尔特的看法,那就是美国过去有能力影响以色列,现在也同样如此。

深评

朔尔茨将二次访华,我们能读出哪些信息?

德国总理朔尔茨计划将于4月13日启程,开始为期3天的中国之行。这将是朔尔茨自2021年12月就任德国联邦总理以来第二次访问中国。

外部环境变化不小

不同于2022年11月的首次访华,据德国联邦政府新闻发言人介绍,朔尔茨此行将访问重庆、上海和北京三地,日程覆盖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内容。这种安排,不禁让人想起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执政期间前后多达12次的中国之行。

不过,拿朔尔茨访华与默克尔访华相比,中德关系的外部环境显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一方面,无论是俄乌冲突等具体事件,还是世界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都为中德关系提出了新的命题和挑战。另一方面,默克尔见证了中德两国之间建立政府磋商机制和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朔尔茨执政后,德国联邦政府于2023年7月公布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份“中国战略”文件,对中国“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的三重定位成为德国新的对华交往基调。朔尔茨既是在“中国

战略”问世后首次访华,又是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两度访华的唯一G7国家领导人。只有全面了解上述复杂的背景,才能对朔尔茨此次访华进行恰当的解读。

传递保持合作意愿

那么,我们能够从朔尔茨此次访华看出哪些信息?

总体而言,朔尔茨借访华传递了与中国继续保持政治合作的意愿。我们不妨做一个比较:美国政府派出国务卿、商务部长和财政部长等技术官僚接连访华,目的是在技术层次上为中美博弈“止损”,实际于博弈大局无涉;朔尔茨访问中国,而且在联合政府内存在疑华声音的情况下,能够在诸如中远集团入股汉堡港码头运营公司等引发德国内部政治争议的事件中做出尊重市场规律的决定,维持了中德关系的大方向,表现出一名政治家的担当和领导力。国际政治观察者经常把朔尔茨的执政风格视为默克尔风格的延续,看来不无道理。

在政治上与中国合作而不是对抗,也是负责任的德国领导人的明智选择。目前,德国陷

入了两场看不清走势和结局的剧烈军事冲突: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前者事关欧盟和德国的安全,德国已经成为排在乌克兰之后的乌克兰第二大军事援助国;后者事关德国基于反思纳粹屠犹暴行而发展出来的理念,即以色列的生存是德国的“国家理性”,也就是今日的德国把历史负罪感转化为对以色列近乎无条件的支持,甚至上升到等同于德国建国道德基础的高度。这两场冲突如何收场,将会对德国造成深刻而长久的影响。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讲道义和负责任的大国,促谈劝和,可以在调解冲突中发挥作用。

拆墙筑路相互走动

中德密切的经贸关系是中德关系的基石。仅就中德两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及相互的经济关系而言,朔尔茨访华也是刚刚晋升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德国的领导人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自己连续8年的最大贸易伙伴的访问,其意义本不言而喻。

然而,中德之间原本良好而互补的经贸关系近来掺进来不少杂音。西方国家近些年逐渐以地缘政治零和博弈思维取代全球化思

维,欧盟和德国政界也有人制造对华经贸交往需要“去风险”的话语,鼓吹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性”。不过即使面临这股逆流,德国2023年的对华投资仍旧创下历史新高,在研发领域的投资尤其明显。目前,德国的经济面临衰退的困难局面和转型的压力,更需要巩固和扩大对华经贸合作。比如,中国强大的新能源产业就可以为德国的环保和能源转型提供低价而优质的技术和产品,而奔驰等德国汽车制造业企业,也发出了欢迎中国新能源汽车竞争的理性声音。此次朔尔茨访华还预计有环境部、农业部、交通部的部长随行,表明了双方将在这些领域展开新的进一步合作,而众多德国世界级企业的CEO也早已成为德国政府访华团的传统成员。

现在应该到了拆墙、筑路、相互走动的时候了。中国从2023年12月1日开始对德国等国家的人员实行单方面免签,上海口岸来自德国的入境人数明显增长。朔尔茨总理此次访华,希望也能够释放出开放与合作的精神。

胡春春(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负责人)